

给量仅5公斤。广大民众只好吃用橡子面蒸的所谓“满洲馒头”，喝豆饼渣掺糠秕、杂谷的“协和粥”。

傀儡自有傀儡的苦衷。作为毫无自主权的人，事事都要小心谨慎，稍有疏忽，便可能酿成大祸。为此，溥仪、张景惠“君臣”二人，还必须将真面目隐藏起来，有时不得不装成两面人。当日本主子面一个样，背着日本主子则另一个样。有一年，张景惠去伪通化省视察，伪总务厅长官与其同行。他少年时就养成了大烟瘾，但拘于总务厅长官的威严而不敢抽。烟瘾犯了，万般无奈，只好去找通化省医院的医生给他打“八布那鲁”麻醉药，以解燃眉之急。仅此一桩小事，便可知日本人对他的监视程度如何，张景惠的内心又是何等地惧怕日本人。

熙洽其人

关志祥

复辟与卖国

熙洽，姓爱新觉罗，号葛民，满洲正蓝旗人。光绪九年（1884年）生于辽宁兴京。是个“闲散皇族”，溥仪的远支宗室，还是搞清朝复辟活动的宗社党的巨头之一。1911年与杨宇霆、张焕相、丁超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8期骑兵科，毕业后执教于保定军官学校。1914年在黑龙江省都督朱庆澜任内任参议。1916年随朱南下广东任督军署参议。张作霖时代回东北，曾任奉天讲武堂教育长，当时张学良正在这个讲武堂求学。1919年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处长，1922年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

军事处长。1924年6月张作相升任吉林督军时，他被提拔为吉林督军署参谋长。1928年末张学良易帜，东北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后，张作相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他继任参谋长兼吉林陆军训练处总监及省政府委员。对他这样一个既无戎马生涯，更无征战功劳的人，能够官居显要，可见民国对他不能说没重用。可他仍对国民包藏祸心，不忘复辟清朝。他在吉林组织了一个所谓“冷社”，网罗了一些清室遗老遗少和无聊之徒，在一起吟诗唱和，抒发因复辟无期而产生的迷惘、苦闷、烦恼和愤恨之情。一次清室遗老宝熙（此人后来任伪满宫内府内务处长、参议等职）路过吉林，熙洽与其臭味相投，彼此倾述衷肠，后来在往来通信中也不离开复辟这个主题。伪满洲国建立，熙洽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伪康德2年2月免去本兼两职，就任宫内府大臣，直至伪满垮台。新中国成立后，病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熙洽就准备借日军的力量恢复清朝，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复辟和卖国往往是联系的，特别是自己无能为力时，必然借助外力，而借助外力必先卖国，熙洽就是按这个逻辑发迹的。

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他暗自高兴，认为这回复辟清朝大有希望了。这时，张作相回兴京为父奔丧，由他代行军政职务，他认为时机对他极为有利。第二天得知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代的教官、日本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由长春进攻省城吉林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一面派少将参议安玉珍持其密函赴长春联络投降事宜；一面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和厅长以下文官举行紧急秘密会议，安排布置省城的投降活动。他对日本驻吉林领事表示：“自己控制吉林军，不向日军进攻，保证日本侨民的安全。”同时在秘密会议上说：“日军强盛，我方绝

难对付，唯有投降皇军是为上策。”

熙洽的卖国行径，遭到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强烈愤慨。在军政官员会议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省府委员诚允坚决反对，他说：“约日军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他看到阻止熙洽的卖国行径已不可能，就毅然退出会场。出席会议的省府秘书长潘鹗年也因为不同意开门揖盗，不辞而别去了哈尔滨市。“熙洽又以高官厚禄多方引诱冯占海，冯对熙洽的卖国行径早已义愤填膺，当即严词拒绝，毅然率部撤出吉林城。”

在长春的多门二郎，没等接到吉林的情报，就率兵乘火车气势汹汹地向吉林进发了。赴长春送降表的安玉珍，在途中某站与日本军用列车相遇，便上军用列车，向多门传达了熙洽的意图。列车到达吉林，熙洽亲自到车站奴颜婢膝地向他的老师多门表示热忱欢迎。

日军进入省城吉林后，立即占领了邮电交通系统的重要单位和军警重要机关，掠夺了官银号大量库银和军械厂的枪支弹药，解除了中国警察的武装，由日军布岗设哨，恐怖气氛弥漫，市民人心惶惶，对熙洽的叛国投敌恨之入骨。

这时熙洽还有一块心病未除，他害怕冯占海的卫队团攻城，搅乱他的叛国布署。遂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招抚冯占海。先威逼，说如果不顺从就抄没家产，调兵围剿，冯占海毫无畏惧。于是他又先后三次派出20余名“士绅”持其亲笔信函，携带10万现洋，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以高官厚禄前去利诱。如果答应归顺，由团长升为旅长，或任吉海护路军司令。又遭到冯的严辞拒绝。

日军进入吉林市的第二天，即9月22日，板垣特派原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副官今田大尉来到吉林，同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商谈，叫熙洽首先出马，组织所谓省的

“新政府”。熙洽于9月26日，把原有军政两个机关合而为一，改称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熙洽命他的亲信，原军政两署的秘书张燕卿、荣孟枚两人，草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9月28日，熙洽召集省属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开会，发表声明：脱离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的关系，抢先在东北宣告“独立”。在日本人眼里熙洽立了头功。

从熙洽的身上，关东军摸到一条经验，即充分利用汉奸，避免行使武力，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条经验可以叫做汉奸政策。此后，熙洽按照关东军旨意派他的同族金名世拉拢诱降原代理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滨江镇守使丁超和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丁超表明服从命令，等待改编；张景惠说：“我与熙老师是同走一条路的，绝对合作。”

但是，汉奸政策对有骨气的中国人并不灵验。11月12日原省政府中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官员，在哈尔滨东的宾县集结，重组抗日的吉林省政府，臧允接受张学良之命任代理省长，冯占海任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熙洽得知这个情报十分懊恼，立即派骑兵第三旅李文炳向宾县进剿，哪知被冯占海所部全给报销了。

受宠与失宠

在军事进犯的同时，建立满蒙独立国的谋划也在加紧进行。1931年12月，引咎辞职的日本原陆相南次郎，做为军事参议官，受日本政府派遣，来到沈阳和辽宁伪省长臧式毅会见，策划筹建伪国方案。当时臧式毅不肯明白表示自己的意见，只说他本人决心与熙洽合作，一切以吉林的主张为准。对于日方拟定的方案，可由熙洽来抉择，他和吉林当局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一来，吉林的熙洽成了关键性的人物，于是南次郎电令吉林

长官公署顾问大迫中佐，向熙洽致意说他来访。

能得到南次郎的垂青，熙洽喜出望外。一天，熙洽派伪财厅厅长孙其昌为代表到车站迎接。当时车站内外戒备森严，日本宪兵全副武装。

南次郎带中岛翻译来到吉林长官公署，熙洽从大门外把他迎到客厅，进行了秘密会谈。南次郎说：如何结束目前东北的混乱局面，“日本拟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赶走张学良改用张作相，在东北建立特殊行政权，统一新局面；另一个是脱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迎接溥仪来东北，建立满蒙独立国。”南次郎说臧式毅既然对你们吉林这样信任，你们就应该明白表示自己真正的主张，不使臧式毅失望。

南次郎的几句话，使熙洽感到自己在日本眼里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博得主子进一步赏识，以求在新国家里捞到重要位置，他慨然表示愿与日军合作，及早解决东北的混乱局面。他说张作相昏庸无能，不堪重用。他表示对日本政府拟定的第二个方案极感兴趣。因为溥仪是满清逊帝，东北又是满清的发祥地，东北“百姓”对逊帝溥仪有一定感情（这时溥仪已到旅顺，由于日本严密封锁消息，熙洽当时也许还不知道）。这次会见，由于事先都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向，戏演得很麻利，南次郎表示同意熙洽的见解。自此，熙洽更加得宠。

其实熙洽为拥戴溥仪，在宣布吉林独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活动。9月30日溥仪在天津接到熙洽的一封信，那是由罗振玉转交的，熙洽在信里说他“期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溥仪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的支持下，先据有满州，再图关内。”只要“皇上”一回到沈阳，吉林即首行宣布复辟。溥仪十分高兴，他曾经寤寐以求的一天终于到了。

熙洽为什么拥戴溥仪？原来他有自己的一步棋，他想启用溥仪建立伪国，他有望争到总理之位，因为他迎立溥仪最积极，又是溥仪的宗室；卖国投敌最积极，得到日本的垂青。至于将来如能复辟大清，他有和溥仪这个关系，更可以过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之瘾。

1932年1月15日，关东军为拼凑伪满洲国，在沈阳召开伪东三省首脑会议，熙洽参加了这次会。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下，就日本炮制的建立“满洲独立国方案”交换意见。

2月14日，又到沈阳参加“建国会议”，参加这次会的主要成员，除熙洽还有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具体负责筹建伪国事宜。会议决定起草“建国宣言”。

这时，熙洽已经知道溥仪到了旅顺，为求溥仪授他“总理”之职，乱次派人到旅顺给溥仪送钱，共有二三十万元。其实，他哪里知道，日本关东军已经把国务总理选定了，只等“执政”就任后签名走过场了。

3月8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人，以“东北人民代表”的身份，把溥仪从汤岗子接来长春。熙洽到四平“迎銮”。在长春车站上，溥仪观赏了一出“迎銮”的滑稽剧。由吉林市的旗人组织了一个40余人的“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接驾队伍大部分打的是伪满国旗或太阳旗，礼节是鞠躬礼，而这个“迎銮团”手执黄缎的黄龙旗，由团长带头行跪迎礼。当熙洽向溥仪介绍说：“这些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20年。”溥仪听了，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自己是大有希望的。其实，这是熙洽为取宠溥仪而导演的一出丑剧。3月9日，在从前的道尹衙门，举行了“执政”就职典礼。

以溥仪为“执政”的伪满洲国成立后，实际的官吏任免权

操在关东军手里，熙洽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兼吉林省长。总理之职没竞争到手，在不久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借机发泄了不满情绪。这次会议讨论各部次长和重要司长的人事安排。总长们事先都有个打算，可是会上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却首先抛出个名单，全是日本人，会场一片沉寂，汉奸们心里反感不敢外露，驹井内心冒火强自镇静。熙洽一马当先开了腔：“这怎么成呢！满洲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聘请几名日本人作顾问是可以的，安插这么多日本人作官成何体统。”他质问驹井：“新政府刚成立，军部也没和我们说过，这个人事安排的方案是谁给作出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驹井正想抓个把柄对这个上了套而又不驯服的奴才震慑一下。猛地站起，声严色厉地训斥起来：“满洲国是怎么成立的，难道不是日本人用生命换来的吗？日本人诚心诚意地希望满洲国将来能够富强康乐，但是这种富强康乐，必须有日本人的全力指导才能获得。所以说，日本政府派遣它的优秀官吏到满洲国来……你们应该表示欢迎，而不应该稍有敌视和怀疑。”然后话题一转接下来：在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哪一个人没有伸手接过关东军的“机密费”，把钱拿到手，现在有什么资格出来捣乱。

这次打击是够厉害的，但并没有使熙洽认识到自己和日本是奴才和主子的关系，奴才只有当主子工具的义务，没有要求主子按奴才意图行事的权力。更没认识到，奴才不顺从就有被主子遗弃的危险，而没有丝毫向主子讨价还价的余地。

溥仪当“执政”一年已过，可是没有改帝制的征候，熙洽觉得这对复辟大清不利，对他自己也不利，他不能默不作声，他要力促实施帝制。“明知不易办，情急切试看”，于是他便贼使心腹喽啰林鹤巢纠集了所谓“奉吉黑三省的前国会议员和满族“遗民”约四五百人，冒冒失失地在长春市的一个小学内，开了

一个假冒民意的请愿实施帝制的大会。可是在殖民地内，不得主子许可而聚众开会不是允许的。所以就在会议进行之际遭到了日本宪兵的当场阻止，与会人员狼狈地悄悄离散。

1934年3月1日，溥仪重登宝座做了皇帝，可是关东军明明说他们承认的是“满洲帝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这就表明他们并不支持复辟清朝。熙洽的“先据满洲，再图关内”的意图又渺茫了，他实在不甘心。他想关东军不支持，日本政府不见得不支持。所以不久他借“修聘特使”访日机会，带了大批珍贵文物做为礼品，进行活动，向日本要人提出他的复辟清朝计划，希望得到支持和援助。但试探几个都碰了软钉子。本庄繁因为对他较熟，便直接了当地对他说：“日本援助满洲民族……谋求独立自主，并不是援助满清复辟。这一点尤应注意。”一瓢冷水总算使熙洽开始清醒了他不想再活动了，收拾起剩下的礼品，快快不乐地离开了日本。

熙洽之流想复辟大清，恢复祖业，可是日本人对中国的政策是逐步吞食，分而治之。一个南辕，一个北辙，刚好相反。因此，在日本人面前越坚持复辟，就愈失宠。

果然，在1935年日本人让孙其昌接任了财政部大臣，熙洽原来的本兼两职全免了，改任宫内府大臣，直到伪满垮台。这次职务的变换和实际权力的缩小，说明他已经开始失去日本的宠信。这对他的复辟梦想不能不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阴险与狡诈

熙洽是个政治上极其阴险、毒辣而又狡猾诡诈的人。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少帅张学良痛恨日本，但感到独木难支，也反复考虑过与南京政府合作的问题，并正在联系，只是时机未成熟，尚未宣布。当吉林的要求易帜的请愿队伍齐

集省署门前，请愿代表入见时，身为省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的熙洽便气势汹汹地要枪杀代表和请愿群众。一时激起请愿群众的极度愤慨，由于被督办公署上将督办张作相拦阻，一场流血惨案，得以幸免。

熙洽念念不忘的是复辟清朝。他想借助日本力量，首先在东北搞他的复辟，民国是推翻满清王朝后建立起来的，是他的仇敌，如果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的民国政府，复辟的最后希望不也成了泡影了吗！对东北的河山，熙洽的态度是“宁赠友邦，不予国人”，因此他仇恨易帜运动，见到力促易帜统一的请愿代表和群众，当然仇恨，非弹压不解其恨。

熙洽的毒辣还表现在，有时为了泄私愤，他可以任意制造罪名陷无辜群众于囹圄。1927年，省立第五中学开除了不守校规的学生数名。其中一名是熙洽姘妇徐某的亲戚。徐某趁与熙洽鬼混之际，添油加醋奏了学校领导一本，熙洽一听勃然大怒。第二天就大兴党狱，以共产党罪名，把校长萧汝伦、教导主任谢雨天，还有学生3名，抓进军法处，反复严加审讯。这几个人本是文弱书生，经过一番折磨，早已奄奄一息。但是终无佐证，无法定罪。军法处请示熙洽，他想就这样释放，对自己不利，干脆都判无期徒刑。后来总算改判谢为9年零11个月，萧为5年，但他为顾全自己的面子，还是想把这几个人折磨死于狱中，可见他有多么毒辣。

熙洽又极其狡猾诡诈。“九·一八”后，当日军入侵长春二道沟并进犯南岭我炮兵团时，熙洽亲自从吉林打长途电话给长春驻军炮团团长穆己臣，叮嘱穆千万不要还击，相信南京国民政府有办法解决，结果日军没费吹灰之力，就解除了我驻军的武装，占领了长春。长春为铁路枢纽，战略要地，这个一向仇恨南京民国政府而今又突然相信起南京政府的熙洽，就这样出

卖了长春，为日军继续向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推进，提供了方便。这本是熙洽的卖国罪恶，但他做贼心虚，就在日军占领长春的第三天，给张作相拍去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说日寇“杀人放火之行为，至甚发指”，而他“衡量形势”为“免去战祸，导入交涉正规”，才下了不抵抗的命令，狡猾地为自己开脱了罪责。

当日本侵略军到达省城吉林时，他为了掩饰卖国行径，装出迫不得已而降的假象，又与多门二郎演了一出滑稽戏，以欺骗世人。多门刚到市内的“名古屋旅馆”下榻，他就去晋见。多门一听他来便传令让他等候片刻。这时多门来到宽敞而华丽的客厅，端坐中央，参谋军官列坐两旁。这个架势仿佛举行受降仪式。熙洽在一个军人导引下进入客厅。他刚想表现他的热忱，可是多门却紧皱着脸，连坐位也没让就厉声问他：吉林的军队一共有多少？现在都驻在什么地方？熙洽站在那里点头哈腰，诚惶诚恐地回答多门的问话，并表示愿缴纳所有枪械，办好移交后再离开。多门说缴纳枪械很好，但是不能离开，你要立刻组织起临时政府。熙洽对让他组织临时政府这件事未予承诺。这时多门立即交脸，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给你20分钟的考虑时间。说完带领参谋们转身退去，把熙洽和刘翻译扔在了那里。此时日军排长率十数名士兵持枪实弹闯入客厅，一支手枪对胸，一支长枪顶背，把熙洽围在中间，十分困窘。刘翻译见如此阵势立刻嚎啕哭叫起来，跪在熙洽面前苦劝暂且答应多门的要求，然后“徐为后图”。此时，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满面堆笑地出现在熙洽面前，装出既同情又热忱的样子说：“日本此次出兵，目的在于驱逐张学良军阀统治，防止‘赤祸’东来，另组政权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满蒙，改善人民生活”。在绝处逢生的情况下，熙洽答应：“关于多门师团长的命令和指示是可以商量的”。

石射退出。这场假戏做完后，多门及其幕僚二次出来，多门换了一幅笑脸嘻嘻哈哈地伸出手来同熙洽握手，并请熙洽坐下，亲切地谈起了他们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往事，畅叙师生旧谊，同时摆上了酒菜招待起熙洽来。在饮酒时，熙洽向多门谈了他卖国的具体设想。

熙洽不仅在政治上阴险狡猾，在生活上也是个贪婪淫残，寡廉鲜耻的酒色之徒。他曾与儿子同嫖一娼，以致父子俩为此冲突而不可开交，这件丑闻在当时简直成了头条新闻传遍吉林。至于同当时最活跃的人物，教育厅长荣孟枚两个携带大小妓女，招摇过市，更是司空见惯。他还仰仗势力，令各县长、各税捐局长，派捐摊款，修筑吉林俱乐部，其规模之大，在省城所有娱乐场中居首。俱乐部内每天莺歌燕舞，彻夜狂欢，成了熙洽的淫乐之窟。

这些秽闻丑事都是伪满建国以前或建国初期的事。后来他就任宫内府大臣，就不能无拘无束了。帝宫对“康德皇帝”溥仪来说是个囚笼，对他这位宫内府大臣来说，恐怕也是一条搁了浅的船。溥仪身边还有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进行看守，熙洽和大部分汉奸大臣，从1940年开始，也都罩在首都警察厅布下的秘密特务罗网之内。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5年）

臧式毅的一生

王文铸

臧式毅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九·一八”事